

榮工棒球隊成立的背景與原因*

黃弘麟**

摘要

榮工棒球隊，泛指榮工處所成立的少棒、青少棒、青棒與成棒等四級棒球隊，是臺灣第一個擁有四級棒球體系的球隊。1970年，榮工處於花蓮創立榮工少棒隊後便在全台相繼成立青少棒與青棒，而後於1978年北遷至板橋。雖然榮工隊在全台地區發展的時間不長，但是花蓮榮工棒球隊的成立及其歷史脈絡卻可追溯自日治到戰後臺灣棒球運動的發展。

本文透過口述訪談、檔案文書、紀錄片等文獻材料之詮釋，意在探析花蓮榮工棒球隊成立之前緣於花蓮本地、榮工處組織與國家機器三重背景因素，有別於以往侷限於國家官方立場的研究成果。首先，本文從日治到戰後1960年代花蓮地區棒球發展的情況談起，了解花蓮地區棒運在榮工棒球隊成立前的發展概況。其次，本文探討榮工處組織在榮工棒球隊成立前的運作情況，並聚焦於榮工處在全台的發展及其與榮工棒球隊成立淵源關係之探討。此外，本文亦論及戰後至1970年代前，臺灣國內外情況與榮工棒球隊發展間的關係，並以榮工處處長嚴孝章在榮工棒球隊的角色作為連結球隊與大時代背景間的橋樑，試圖解釋嚴孝章成立棒球隊的原因。

關鍵字：榮工棒球隊；花蓮棒球運動；榮工處；嚴孝章

* 本文由匿名審稿人多所賜教，受惠良多，甚為感謝。惟若文中仍有疏誤之處，文責盡由筆者承擔。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 一、前言
 - 二、日治到戰後花蓮地區棒球的發展情況
 - 三、1970 年以前榮工處在花蓮的發展
 - 四、榮工棒球隊成立的外部因素
 - 五、榮工棒球隊成立的內部因素
 - 六、結論
-

一、前言

榮工棒球隊，泛指榮工處所成立的少棒、青少棒、青棒與成棒等四級棒球隊，是臺灣第一個擁有四級棒球體系的球隊。1970 年，榮工處於花蓮創立榮工少棒隊，成立之初主要是為了讓在「慈園」¹的小孩有遊戲的場所，不過在參與少棒比賽後，便以花蓮市「鑄強國小」為班底，開始向花蓮地區挖角有潛力的好手加入球隊，並集中在「慈園」住宿及訓練。1971 年，榮工青少棒隊便參賽全國中上棒球賽，以花蓮市「美崙國中」為招收球員，其中大部分來自榮工少棒隊成員。為了將這群從榮工少棒開始訓練到榮工青少棒的球員們繼續留在榮工體系，榮工處於是在 1977 年催生青棒隊，而 1978 年北遷後則以中華中學為球隊主體。1981 年，也因為要留住棒球人才而成立成棒隊，以輔仁大學為球隊主體。²

1 「慈園」是榮工處為了照顧父母被調往外地或海外工作，以及亡故的榮民所遺留下來的十二歲以下榮民子女而設立的機構，在「慈園」的榮民子弟平日早上會在慈園附近的學校上課，下課後會由學校老師在慈園進行課後輔導。最早設立的「慈園」是 1963 年位於臺北新店的臺北「慈園」，而後在 1967 年在花蓮設立第二所；1978 年將兩所「慈園」裁撤合併於臺北板橋，目前的板橋「慈園」現址為榮工處的工程材料部。整理自〈榮工處探秘〉，收入於「營建一部」：<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4/C0413220032/build.htm>，2016/7/29 取閱。

2 榮工少棒在 1978 年北遷後，歷經板橋國小、板橋中山實小後於 1988 年解散；青少棒北遷後歷經板橋國中、華僑國中、溪崑國中後在 1992 年解散；青棒隊在 1999 年結束與中華中學的建

關於榮工棒球歷史發展直接相關的研究論著，僅有沈祥琳所著之〈榮工棒球隊興衰之研究〉。³沈氏這篇學位論文簡單介紹榮工棒球隊的歷史發展，探析榮工棒球在臺灣棒球界的地位，並聚焦在國家體育政策、榮工隊的訓練方式對球隊的影響，其主要研究問題意識為榮工棒球隊創立背景與發展脈絡、球隊戰績對球隊發展的影響，最後在結論總結榮工棒球隊的利弊得失，並提出個人的建議。然而，沈氏在其論文中，並未針對國家政策的影響進行脈絡分析，僅條列點到為止，並無深入細究。其次，沈氏文章大多數篇幅旨在描述榮工各重要賽事的比賽經過，過度注重賽事描寫而使研究淪為棒球賽事研究。該文使用的研究材料也僅限於報章雜誌，也因為如此，在其研究視角上，易受國家官方立場影響，而僅注重有關國家榮譽的報導，實為其不足之處。最重要的是，沈氏一文在年代考證方面有所缺失，例如：文中榮工棒球隊的創建年代究竟是 1970 年還是 1971 年，並沒有解釋清楚，這點是為最嚴重的缺失。

本文不僅利用報章雜誌，更以與榮工棒球相關的檔案文書、紀錄片、人物訪談資料作為主要分析素材，且在觀點上異於沈氏文章的論證角度，從嚴孝章對榮工棒球隊的影響作為切入點，藉由人物訪談資料來深入探討關於榮工棒球成立前在花蓮之情況，並分析在國家與榮工處組織等外部因素的影響。此外，由於榮工棒球隊在花蓮成立，因此本研究從花蓮地區棒球發展的視角切入，來看榮工棒球隊在花蓮成立的背景與原因，以期能更

教合作後改與強恕高中合作，不過依舊在 2007 年底結束合作關係；成棒隊在 1993 年結束輔仁大學合作後，1997 年以合作方式與臺灣大聯盟成立那魯灣榮工棒球隊，但隔年再度解散。2003 年起改以贊助方式資助臺北體院棒球隊，至 2006 年底結束。整理自〈臺灣棒球維基館〉，收入於「榮工棒球隊」：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6%A6%AE%E5%B7%A5%E6%A3%92%E7%90%83%E9%9A%8A>，2016/7/27 取閱。

3 沈祥琳，〈榮工棒球隊興衰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6 月）。



貼近花蓮棒運的實際情況。

本文除了利用訪談資料，將會穿插《更生日報》、《聯合報》、《民生報》、《中華日報》等報紙以及〈百鍊成鋼〉紀錄片的逐字資料，⁴另外，在論述過程中提到許多與榮工棒球隊相關之人名，皆參考〈臺灣棒球維基館〉⁵之資料，並對人物做簡單的介紹及說明。

因此本文的第二部分首先回顧榮工棒球隊創立前的花蓮棒球發展史；第三部分則是介紹榮工處組織於榮工棒球隊成立以前在花蓮發展的過程；第四部分探討臺灣當時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局勢等因素是如何作為榮工棒球隊成立的外部因素。最後，第五部分討論國家政策與嚴孝章作為國家及榮工處組織和榮工棒球隊參與者間的橋樑角色，探討嚴孝章組織棒球隊的原因。

4 《百鍊成鋼》為榮工處彙整榮工棒球隊 1970 年至 1979 年活動畫面後，於 1979 至 1980 年攝製之〈退除役官兵的工程建設經營（第二十八輯）——百鍊成鋼：榮工棒球隊的奮鬥〉。「退除役官兵的工程建設經營（第二十八輯）——百鍊成鋼：榮工棒球隊的奮鬥」，〈百鍊成鋼（榮工棒球）錄影資料〉，《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國家檔案局藏，檔號：A332410000K/0068/0110117/00001。該紀錄片以近似新聞報導的方式述說 1970 年榮工少棒在花蓮慈園成立及其環境背景，以及 1974 年與 1977 年榮工青少棒與青棒隊之成立，此外還有 1970 年代各隊參加國內各項比賽之戰績、1976 年榮工少棒隊代表國家前往關島參加遠東區少棒錦標賽之經過、1978 年榮工青少棒隊代表國家參加世界青少棒錦標賽並奪下冠軍之經過等內容。為了使讀者了解影片的內容，筆者將影片中的文字打成一份逐字資料。

5 臺灣棒球維基館，為一線上開放協作之臺灣棒球資料庫，其原本為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研究小組執行之國科會計畫「臺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之建置」的加值成果，自 2005 年 4 月 14 日正式開站。目前已成為臺灣尋找棒球資料的重要來源。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9%A6%96%E9%A0%81>，2016/11/6 閱。

二、日治到戰後花蓮地區棒球的發展情況

1906 年臺灣開始有棒球隊的記載。⁶而臺灣東部棒球運動的發展直到 1917 年才出現在文獻中，花蓮的紀錄又略晚於臺東。根據《臺灣棒球一百年》與《臺灣棒球王》對日治初期棒球運動發展的描述，在棒球剛傳入臺灣時不管是企業組建的棒球隊還是學校棒球隊，都只有日本人從事這項運動。⁷就此而言，棒球早期傳入花蓮時亦復如此。另外，日治初期的花蓮，由於各項建設仍待發展，各級學校亦成立不久，因此學校棒球並非花蓮棒球發展的主力。

那最早在花蓮打球的臺灣人呢？文獻中雖無明確記載是誰，但理應在棒球傳入花蓮時就有臺灣人受到日人影響而接觸棒球，而這群最早在花蓮打棒球的人中，有一個影響整個花蓮棒球運動最初發展的推手，他的名字叫做「林桂興」。⁸林桂興在臺東工作時即加入「櫻組」⁹棒球隊，來到花蓮亦參加任職處成立的棒球隊，成為目前現有文獻中最早加入花蓮企業棒球隊的臺灣人。¹⁰林桂興於舢舨組內任職的角色為「苦力頭」¹¹。在與這些工

6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頁 1。

7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果實出版社，2003），頁 20-29。；曾文誠、孟峻璋，《臺灣棒球王》（臺北：我識出版社，2004），頁 29-33。

8 林桂興，生於 1899 年、卒於 1947 年，臺東人。幼時就讀臺東公學校，但當時的臺東尚無法確定有無棒球活動，因此比較合理的說法是他就讀臺北國語學校時才學會打棒球。求學階段結束後返回臺東進入櫻組工作亦加入該企業的棒球隊。後來調至花蓮朝日組，才有機會成立高砂棒球隊。林桂興除了熱愛棒球，亦熱心於地方事務，不過也因為這樣，成為戰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整理自葉柏強，《臺灣棒球史第一人：林桂興與他的時代》（花蓮：花蓮縣文化局），頁 2-5。

9 櫻組為賀田組拓殖部門外的其他事業，屬於「花蓮港卑南運輸組合」的卑南支，花蓮港支部分即為朝日組。組織的營業項目主要以海陸運輸、倉庫、製材業為主。參考鍾淑敏，〈政商與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收錄在《臺灣史研究》，第 11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頁 104。

10 整理自葉柏強，《臺灣棒球史第一人：林桂興與他的時代》，頁 8-10。

11 意為管理花蓮港邊拉送船隻與搬運貨物的工人。

人相處過後，他明白這些工人們多為原住民出身，並對他們的體力有所了解，在一次機緣下，讓他興起成立球隊的念頭。¹²於是，在大正十年（1921年），林桂興成立由原住民球員組成的「高砂棒球隊」。經過短短兩年的訓練，這群原住民小夥子從不會打棒球的白紙球員到能夠與花蓮當時的企業球隊相抗衡。

日治時期花蓮棒球的發展除了林桂興的直接推動之外，背後日本企業家的協助也是值得注意。雖然這些日本企業家利用棒球隊來達成政治宣傳與教化的目的，卻也間接促成日後花蓮棒球發展的濫觴。林桂興與梅野、江口等人培育的「原住民棒球隊」，不僅在日本球壇引起旋風，球員退役後，更為花蓮當地棒球發展起了帶頭的作用。

高砂棒球隊，由林桂興於大正十年（1921年）成立，當時的成員皆為阿美族原住民。¹³大正十一年（1922年），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企業家梅野清太等人將這群高砂棒球隊隊員安排入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現花蓮高農前身）就讀，並更名為「能高團」，任命林桂興與門馬經祐擔任球隊教練。不過日人培育能高團可能有其目的性，¹⁴在駱香林〈花蓮築港記〉中有描述可能的原因：

當是時日本甲子園之棒球方興，江口思內閣諸人之惜費，為花蓮之名，未入其耳，欲以振之。乃從農業補習學校（阿美族之初級中學）嚴選數人，使門馬經祐教之，是謂能高棒球隊。每上午上課下午訓練，數月之後，其技大進。民國十四

12 葉柏強，《臺灣棒球史第一人：林桂興與他的時代》，頁 21。

13 葉柏強，《臺灣棒球史第一人：林桂興與他的時代》，頁 16。

14 臺灣野球史中有提到另一目的：利用棒球來教化原住民的「野蠻」，使他們成為順從的日本公民，整理自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43-244。

年七月，命門馬與其校長坂本，率往日本，與早稻田實業、京都平安中學、大阪八尾中學、廣島中學等比賽，勝者五，敗者五，日人初不料其技之精如此，大為駭異。于是平安中學請得伊藤兄弟與稻田（皆阿美族之改名）等數人轉學其校，平安遂為甲子園冠軍。既畢業又入法政大學，嘗與東京六大學賽球，每勝之，至是花蓮之名，日人無老少，無不知矣。¹⁵

由此可知，江口良三郎想利用能高團來打響花蓮在日本內地的知名度，藉此募得籌建花蓮港的費用，能高團也沒有辜負江口的期望，在赴日巡迴賽後一舉震驚當時日本中學棒球界。而能高團的數位成員也在這次到日本的巡迴比賽後，受到日本平安中學的挖角，得以赴日發展。

可惜的是，由官方培植的能高團並未對花蓮當時的棒球界產生影響。在江口良三郎死後，能高團便失去官方宣傳力量而銷聲匿跡，因此花蓮地區仍是以企業棒球隊為棒球運動主要參與者。除了能高團以外，花蓮港中學棒球隊在日治時期甲子園比賽留有出賽紀錄。花蓮港中學成立於 1936 年，其棒球隊在 1938 年就曾經在該年夏季甲子園臺灣地區選拔賽留下參加紀錄。1941 年，該球隊更在春季甲子園臺灣區選拔賽以一比零擊敗嘉農，得以代表臺灣出賽，只是 1942 年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甲子園賽事中斷，花蓮港中學棒球隊無法前往日本留下比賽紀錄。同樣地，花蓮地區的企業棒球賽也因為太平洋戰爭而停辦，使得棒球發展停滯一段時間。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花蓮棒球在經過戰爭洗禮後出現甚麼現象？

15 駱香林，〈花蓮築港記〉，收在《花蓮文獻》創刊號（花蓮：花蓮文獻委員會，1953），頁 75-76。

出生於日治時期的高文章¹⁶在訪談中就提到：

戰後不久，花蓮的棒球很快就恢復了，而且很多隊，日本人走了，所以都是臺灣人在打。當時其實很亂，很多人打，但大家都不內行，不太懂棒球規則，一邊打一邊學，所以常常起爭執，球場上常見到兩隊大小聲，所以就要靠黃進財這樣的前輩，指導基本動作、比賽原理、棒球規則。¹⁷

同時期的蘇如松¹⁸也提到：

戰後花蓮市的棒球風氣興起，我跟我哥哥也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棒球隊，這是戰後花蓮組織的第一支棒球隊。鐵路內部也有組隊，因此我在鐵路局工作時，會跟各地車站或者鐵路局中不同單位組成的球隊交流…鐵路之外，公司行號也有很多隊伍，酒廠、臺電、安隆貨運、花蓮貨運等，大概有七、八隊左右，各個機關公司會提供打球的用具，但是有的球隊也沒有維持很久……戰後花蓮人打棒球都是打好玩的，輸贏也不管，以前只會撿球的人也出來玩，沒有規則的，都是「土師仔」，沒有訓練過的，打趣味的。戰後開始打球的時候，都是黃進財在指導，他的訓練很嚴格，跟日本時代一樣。¹⁹

可以看見，在日治時期從事棒球運動者，到戰後仍有極大機會繼續打

16 高文章，1928 年出生，花蓮市人。日治時期在就讀公學校時就曾經參與打棒球；戰後更是成為花蓮省運棒球隊的主力選手，退下球員身分後曾在榮工棒球隊擔任教練。

17 謝仕淵，《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頁 159。

18 蘇如松，1923 年出生，花蓮市人。日治時期曾參與公學校少棒隊；戰後亦成為省運花蓮隊的主力，球員退休後則在花蓮地區擔任棒壘球裁判，亦協助榮工棒球隊的訓練。

19 謝仕淵，《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頁 118-120。

棒球，因為當時仍有許多公司組建球隊，才會出現許多企業球隊比賽的盛況。有趣的是，這兩位受訪者皆提到，戰後初期花蓮棒球除了企業球隊間的對抗外，黃進財扮演的「教練」角色亦有其重要性，他教導許多戰後花蓮棒球的參與者如何正確的打棒球，更將日式的訓練法用來訓練戰後花蓮的棒球參與者。至於黃進財何許人也？文獻中關於他的敘述並不多，大抵與林桂興一樣是花蓮地區最早接觸棒球的臺灣人之一，他在戰後曾經代表花蓮參與省運棒球賽，從球員退休後在花蓮地區擔任棒球比賽的裁判。此外，戰後花蓮地區，乃至於全臺灣人當時風靡的棒球活動，非省運棒球賽莫屬。

省運棒球賽是以臺灣各縣市為組隊單位，戰後初期參與賽事者大都是各地企業棒球隊中的佼佼者，而這些人又多在日治時期就參與棒球運動，諸如林桂興、黃進財、高文章、蘇如松、葉日好等人皆代表過花蓮參與省運棒球賽。

「花蓮隊的特色就是速度快，如果省運棒球隊要比大隊接力，一定第一名！」²⁰這是葉日好談到戰後花蓮棒球代表隊的球風。因為當時隊上擁有許多名同時參與省運「田徑」賽的球員，諸如徐天德、施阿勇、林德生、徐石山、朱利隆、吳春財等人都曾經在同一年以棒球和田徑隊員雙棲出賽。在田徑場上獲得無數榮耀的他們，也將出色的運動能力展現在棒球場上。其中，徐天德的打擊號稱花蓮版的「王貞治」，是當時花蓮隊擊球力量最強的隊員；施阿勇是花蓮版「魔手」，耐投又擅長變化球的他經常讓打者摸不著頭緒……²¹，這群田徑好手與日治花蓮的棒球參與者讓戰後花蓮棒球發展

20 謝仕淵，〈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頁 218。

21 林將，〈田徑冠軍鄉·桓桓六壯士〉，《民生報》（臺北），1979 年 2 月 9 日，02 版/大事記。

得以延續。

時間回到二次大戰前，一個受戰後花蓮棒球參與者尊敬的人物回到他的家鄉太巴塢，過著教書的生活。他可能無法想像，自己的影響力居然遠達六十年後的花蓮棒壇，他是莊初明，更多人尊稱他叫「伊藤先生」。莊初明即是能高團在日本交流賽後赴日發展的羅沙威，後來的日本姓名為伊藤正雄，花蓮光復馬太鞍地區出身的他赴日加入平安中學後，便數次打進甲子園賽，中學畢業後進入法政大學就讀，亦擔任隊上的王牌投手。受業返國後回到家鄉光復的富田公學校（現今的太巴塢國小）教書，也在當地推展棒球運動，並於戰後 1949 年成立太巴塢少棒隊。²²同一年在光復國小，蔡慶隆²³也成立了光復少棒隊，主要打軟式棒球比賽，也因為這兩支球隊的成立，為光復地區的棒球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1960 年代花蓮地區棒球發展情況，仍以花蓮市周邊以及光復地區為主，但相較戰後初期的風靡程度，似乎呈現退燒的情況。由於 1960 年代省運棒球賽花蓮隊的成績一直不太出色，加上戰後初期參與省運棒球賽的球員因為年紀與身兼多項比賽項目，不再繼續參加，使得隊伍實力面臨青黃不接的窘境。此時期花蓮的企業球隊也有所減少，業餘社會人棒球隨著球員退役或擔任三級棒球教練，加上 1968 年紅葉少棒擊敗日本少棒冠軍代表隊，1969 年金龍少棒隊獲得威廉波特少棒賽冠軍後，臺灣三級棒球的發展逐漸受到國家重視。

1966 年成立的國光商工，為了招生需要而創立了青棒隊，是當時花蓮

22 整理自石忠山編，《太巴塢部落》（花蓮市：花蓮縣文化局，2008），頁 75。

23 蔡慶隆，1921 年生，花蓮光復人。會參與棒球，主要是與參與花蓮公賣局棒球隊的哥哥有關。戰後剛從宜蘭農專畢業的蔡慶隆，恰好得到回光復國小教書的機會，也因為熱愛棒球的心，開始籌組棒球隊，一當就當了三十餘年的教練。

地區最早的青棒隊，吸引許多從花蓮各地來的球員，而後更聘請曾經在亞洲杯擊敗日本的投手豐自吉（後改名為豐祥瑞）²⁴擔任教練。

參加全省第廿六屆省運會的花蓮代表隊，於昨（四）日下午四時卅六分凱旋賦歸，受到了花蓮市民極熱烈的歡迎……歡迎場面極為壯大，鞭炮聲不絕於耳，造成了一時的盛況……接著，在樂隊前導之下，全體選手遊行了市區，各商店均燃放鞭炮，街上行人亦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對全體本縣省運選手們的歡迎之意。²⁵

1971年，以國光商工球員為班底的省運花蓮棒球隊，一路連勝拿下花蓮省運棒球賽唯一一座的冠軍。從引文中可以看出花蓮市民對這座冠軍有多麼高興，代表花蓮當地仍對棒球運動抱有期待。當時花蓮棒委會主委蘇祖繼表示：「本縣在省運球賽史上，首度奪得棒賽冠軍，是一個好的開始。」²⁶他可能沒想到這個好的開始，恰好接上榮工棒球隊的崛起，準備重新燃起花蓮地區的棒球風潮。

三、1970年以前榮工處在花蓮的發展

1970年代除了是榮工棒球隊起飛的年代，也是榮工處最富盛名的時期，期間除了負責臺灣「十大建設」的建設工程外，也到國外幫助友邦進行基

24 豐祥瑞，1939年生，臺東馬蘭人。是臺灣第一個在國際正式比賽擊敗日本隊的投手，球員生涯結束後陸續擔任各級棒球隊教練。1971年帶領國光商工青棒隊跨組參加業餘成棒水準的省運賽，竟拿下冠軍。後來也成為榮工棒球隊教練團的一員。

25 〈省運棒球冠軍榮歸 花縣各項體育選手均表現優異 昨凱旋東回受到各界熱烈歡迎〉，《更生日報》，1971年11月5日，第二版。

26 〈省運棒球冠軍榮歸 花縣各項體育選手均表現優異 昨凱旋東回受到各界熱烈歡迎〉，《更生日報》，1971年11月5日，第二版。

礎建設，成為臺灣外交的活招牌，更是榮工棒球隊重要的經濟後盾。身為榮工體系的球隊，榮工棒球的興衰與榮工處各個時期的發展有密切關係。榮工處作為國營機構的一部分，受當時國家政策影響至深。1956年成立之初名為「國軍退除役官兵建設工程總隊管理處」，由臺灣省政府建設廳代管更名為「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榮民工程總管理處」。迨至1957年改隸退輔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後更名「臺灣榮民工程管理處」，1970年才正式定名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1990年代榮工處為配合政府「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政策，在1998年改制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²⁷雖然不斷因改隸、政策操作而更名，但大家仍舊習慣稱呼「榮工處」。而本節將以1970年以前榮工處在花蓮的發展，作為榮工棒球隊成立的背景因素。

戰後臺灣的國民政府為了安置退役的國軍，退輔會於1956年成立榮工處，²⁸負責管理承辦東西橫貫公路的四個榮民工程隊，²⁹其中，中部橫貫公路的建設是榮工處在花蓮地區建設的開端。榮工處自從在中橫公路工程開始在花蓮的建設後，隨著每項工程的開始與結束，榮工處在花蓮的組織也隨之調整。³⁰首先1960、1963年榮工處因為組織業務急速擴展而有兩次擴大編制，歷經擴編後，負責東部工程的榮工處單位主要為第一工程隊、第六工程隊和大理石工廠採石分隊。第一工程隊負責光豐公路三期、富源護

27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輔導會真情故事—榮工事蹟篇》（臺北市：退輔會，2007），頁2-3。

28 榮工處的成立與美援有關。美國當局為了汰除臺灣日漸龐大的冗兵，在美援經援項目下撥款給退輔會，用來安置退役之官兵。其中經費中的1/3被用在興建橫貫公路之計畫上，這正是榮工處成立經費來源之始。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出版，1985），頁226-235。

29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榮民工程事業五十年》（臺北市：退輔會，2007），頁28。

30 林世曼，〈榮工處與東臺灣的建設〉（花蓮：國立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20。

岸等工程；第六工程隊負責馬太鞍溪、大武漁港等工程；³¹大理石採石分隊則是進行中部橫貫公路建設時，中橫工程隊發現太魯閣地區有許多大理石的礦藏，後經政府調查後認為有其開發價值，遂令中橫工程隊派一支工作隊進行大理石的開採。而後榮工處在花蓮地區的發展主要就是依賴建設工程隊與大理石工業來進行其他業務的擴展。

1964年榮工處成立東部施工處，開始專注於花蓮、臺東間的道路鋪設，由於本文討論範圍界定為花蓮地區，因此臺東的部分不在討論範圍內。花蓮地區部分，先後完成光豐公路拓寬、花蓮海岸公路、³²東富公路³³等道路工程，讓花蓮地區道路網更加完善，而花蓮海岸公路的完工，更是連結起全臺環島公路的系統。³⁴

自從中橫工程隊在建設中橫公路時發現大量大理石礦藏後，政府為了開採大理石，於1961年，由退輔會成立「花蓮榮民石礦場」，起初採集大理石供應臺灣肥料公司花蓮廠製造肥料大理石工廠。1962年，為了使大理石產品有更多經濟上的利用，在花蓮市海濱街設立大理石藝品工廠，利用手工打製與車床機具進行工藝品製造。1963年，花蓮榮民石礦場改由榮工處接管經營，並改名為大理石工廠，³⁵除了擴大工藝品製造的人力與機具外，

31 〈光豐公路三期工程 近期可告全部完成 東部工區施工分隊辛勤趕工忙〉，《榮工報導》，1964年4月15日，116期，第四版。

32 花蓮海岸公路(臺十一線)，北起花蓮市，越花蓮溪，循海岸山脈東麓太平洋岸南走，經鹽寮、水璉、磯崎、新社、豐濱。黃新興編，《續修花蓮縣志·交通篇》(花蓮：花蓮縣政府，1994)，頁26。

33 省道臺23線，西起花蓮縣富里鄉臺9線處，東至臺東縣東河鄉連接臺11線。

34 榮工處成立後至1970年之前在花蓮的建設如下：東西橫貫公路工程(1956-1960)、馬太鞍溪工程(1961-1962)、光豐公路(1962-1966)、玉里醫院(1962-1963)、蘇花公路大濁水橋(1963-1964)、慈母橋工程(1963-1965)、蘇花公路隧道、橋樑(1964-1965)、立霧溪水壩護堤工程(1964-1965)、橫貫公路東段拓寬改善工程(1965)、東部產業道路(1965-1968)、林務局林道(1967)、大濁水林道(1967-1968)、林田山鐵路延長工程(1967)。整理自林世曼〈榮工處與東臺灣的建設〉，頁23-36。

35 〈榮民領導下的一花蓮大理石工業〉，《榮工報導》，1967年5月5日，226期，第四版。

更隨著榮工處海外工程的建設開始擴展海外市場。

榮工大理石工廠主要以大濁水、和平、三棧三大礦場為主要採礦區，由於礦區皆位於崇山峻嶺中，因此礦工必須長時間待在礦區，無法經常回家。榮工處為了照顧礦區工人們的子女，特別由大理石工廠在 1967 年設立花蓮「慈園」，³⁶讓父母經常在外地工作的小孩得到良好的照顧與教育。

慈園的成立，是為使榮工處在國內外施工中的榮民能安心工作，而使他們的子弟在園中享有一切免費的學業教育和正常的生活輔導。在規律的日常生活中，透露出一股大家庭的溫暖和快樂，而在整體性的群體性生活中，能養成團結合作、自立自強的精神。晚上的課業輔導，是加強他們品德學業上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是使在園中的各種球隊的球員確實做到了德、智、體、群四育兼備的好球員。³⁷

從引文當中，可以看出慈園成立目的除了學業教育之外，日常的生活輔導亦是重點。此外在榮工棒球隊成立後，雖然也有花蓮慈園內的子弟加入球隊，但大多數其實從花蓮各地而來。這些來自花蓮各地的學童，都集中在花蓮慈園住宿，而其他榮工處在花蓮的運動代表隊也是如此。是故，為了使這些球員在練球之外能夠跟得上學業，花蓮慈園也負起照料這群小小運動員的生活起居與課業輔導的重任。

36 花蓮慈園舊址位於今天美崙國中旁，其校舍為臨時搭建的活動房屋，包含寢室、餐廳、浴室、廚房等設施，現已全部拆除。園中學童白天在附近的復興、鑄強國小上課，傍晚才由校車接送至園中。在慈園的起居作息皆由保母指導，衛生醫療則由大理石工廠醫官兼辦，另外每位學童皆發給伙食費三百元。〈改善榮眷生活 慈園讓榮工子女免費就讀〉，《榮工報導》，1967年3月5日，218期，第2版。

37 筆者整理，〈百鍊成鋼—榮工棒球隊的奮鬥(影片逐字)〉，頁1。

榮工處在花蓮的多項建設不僅帶動花蓮地區的發展，更提供許多工作機會給花蓮的民眾，諸如美崙工業區、大理石礦場等工業區³⁸以及榮工處在花蓮承辦的各個公路工程都可看到許多花蓮人在其中工作。³⁹以太巴壟部落為例，當時部落勞力大量投入榮工處所承辦之國內外的工程建設，每個月匯入家鄉各金融單位的匯款額，估計約有三至六千萬元左右，使得部落經濟重新活絡起來。此外，榮工處的福利在當時的花蓮算是相當優渥，就算不在榮工處工作的花蓮人也知道加入榮工處等於擁有了穩定的工作與薪水。也因為這樣榮工處變成 1960 年代花蓮地區工作「鐵飯碗」的代名詞。

四、榮工棒球隊成立的外部因素

1970 年代前的臺灣在國際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都正處於轉變極快的過渡時期，而榮工處身為公營工程單位，自然受國家當時的內外情勢所牽動。因此本節將敘述 1970 年代以前臺灣在國際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的概況作為榮工棒球隊成立時的大時代背景，再進一步探析榮工處成立棒球隊的可能原因。

國民政府在大陸失守後於 1949 年撤退來臺，當時國際間對於中國的內戰保持觀望的態度，因此在國民政府來臺後到韓戰爆發前這段時間，除了蘇聯與中共結盟對抗國民政府外，國民政府少有外交奧援。直到韓戰期間美國為了防堵共產勢力向亞洲各地擴張，派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使臺

38 美崙工業區與和平礦區工業區設置後，為東部地區增加四千個就業機會，並使花蓮縣每年的稅收增加新臺幣約四億元。除此之外，亦改善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帶動地方工商與服務業的發展。林世曼，〈榮工處與東臺灣的建設〉，頁 140。

39 國民政府於 1970 年代前後的公共工程建設，讓許多部落青年投入，當時大約有 80% 的人在建設行列之中，是改善經濟環境的重要挹注；另外，榮工處到沙烏地阿拉伯、中東地區及印尼承攬工程，需要大量國內的技術人員與勞工，部落更是紛紛加入此行列，因此該年代也成為部落經濟最為活絡的時期。石忠山編，〈太巴壟部落〉，頁 157。

灣免受中共攻擊，解救了臺灣的危機。韓戰後，國民政府與美國建立聯盟關係，也由於中共參戰韓戰之因，讓中共與他國的國際關係降到冰點。1950年代前期，國際情勢轉趨對臺灣有利，自由世界的國家紛紛與臺灣建交。不過在中共 1954 年開始對外展開和平攻勢後，其在國際社會中日漸活躍。1955 年開始，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獨立，許多國家分別與臺灣或中共建交，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開始受到中共挑戰。

進入 1960 年代，國際情勢又有很大的轉變，首先是蘇俄與中共間的關係開始惡化，讓美國欲以拉攏中共來牽制蘇聯。只是後來因為中共開始文化大革命，以及美國參與越戰，讓中美間的關係再次交惡，這也讓臺灣國際地位的保衛戰得以暫緩。可是，在 1969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就任後推行「越戰越南化」政策後，美軍逐步退出越戰，與中共間的關係也漸漸緩和，加上同年毛澤東在取得文革勝利後，重新展開外交攻勢，至此，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日漸緊密，也影響世界的外交形勢，最終導致臺灣退出聯合國。

40

嚴格說來，1970 年以前臺灣所處的國際情勢，並不是影響榮工棒球隊成軍的原因，但是卻能夠當成日後榮工棒球隊成名的原因。因為臺灣在 1971 年退出聯合國，也是在退出聯合國後才面臨中共處處打壓的國際外交困境，以至於日後臺灣必須利用國際型的賽事來提高國際能見度。榮工棒球隊在 1970 年成立，時間上更早於臺灣外交困境的開始。因此榮工棒球隊的成立，較合理的推測，應與當時的經濟、社會背景有關。

經濟方面，1960 年代的臺灣經濟，雖然受美、日等國的影響，但從此

40 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50-1972)》(臺北市：五南出版，1993)，頁 34-40。

時期開始，臺灣逐步累積外國資本，直至 1960 年代末期，臺灣已重新蛻變成外資投資的新天地。時間拉回 1950 年代，臺灣經濟受到韓戰（1950）過後「美援」的實際金援，讓戰後搖搖欲墜的臺灣經濟得以逐漸安定，並開始發展起農產品加工的小型工業；1950 年代末期「進口替代」的政策實行，輕工業開始發展，但不久之後卻遇到許多問題，諸如資金不足、市場狹小、高利貸等困境。⁴¹因此，企業開始向外尋求更多的資金與市場；而政府亦意識到這些問題，逐步推行振興出口的經貿政策：首先在 1958 年 11 月實施外匯制度的改革，將原本的複式匯率改為單一匯率，緊接著在 1959 年 12 月、1960 年 9 月，公佈「外國人投資條例」與「獎勵投資條例」，⁴²既積極引入外國資本推動國內經濟發展，亦擴大了國內企業的投資環境。如此一連串的轉變，讓原本自力更生的臺灣經濟逐步與世界連結。

以此政策為楔子進入到 1960 年代，前期（1960-1965）的外國資本主要與國內的公營企業結合，諸如中國石油、臺灣肥料等公營企業，由外資提供資金及技術，而外資藉由與公營企業的合作達成獨占臺灣市場的目的。除了外資與公營企業的合作外，純外資企業仍屬少數，雖然此時期仍有美援的協助，但這時候的美援已不是韓戰後單純的資金贈與，而轉變為一種國際借款。⁴³為了因應即將停止的美援，1960 年代後期，國民政府另行設置「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合會）來協助投資條例的修訂以及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的制訂。⁴⁴藉由加工出口區的設置搭配關稅、投資優惠等措施，讓相較歐美等地更為低廉的臺灣勞力市場能夠被外資看見，逐漸累積足夠外國資本。從此之後，臺灣漸漸脫離傳統的農工業，轉變成工商

41 劉進慶，《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市：人間出版社，2012），頁 258。

42 劉進慶，《臺灣戰後經濟分析》，頁 259。

43 劉進慶，《臺灣戰後經濟分析》，頁 363-371；趙既昌，《美援的運用》，頁 7。

44 中華民國年鑑社編輯，《中華民國年鑑》（臺北市：中華民國年鑑社，1956），頁 148-156。

服務業為主的資本化國家，一舉躍入工業化國家之林。

經濟型態的改變，也對 1960 年代的臺灣社會產生影響。首先是物質生活的變遷，戰後初期的臺灣仍屬於傳統的農業社會，生活作息較為規律，資本累積不易，其物質生活比較單純，且多半圍繞在維持日常所需，消費習慣也相對保守。由於棒球運動是項成本花費相當高的運動，一整套棒球裝備（手套、球衣、球襪、釘鞋……等等）的花費動輒數千塊，而且必須持續性的消耗，這對戰後初期的臺灣民眾而言負擔相當大，因此除非是家境不錯的小孩才有機會學習棒球，這也是棒球運動到現在始終無法完全普及在臺灣社會上的原因之一。進入工業社會後，由於工作型態不同，造成作息時間因職業而有所差異，打破傳統的作息時間，讓臺灣人利用時間的方式更加多樣性。加上當時大環境有利資本的累積，使得臺灣人的消費行為產生改變，願意進行日常生活以外的消費，例如教育與休閒活動。

另外，加工出口區的設立，更是讓臺灣的棒球發展有了新的轉機：球具不再完全依賴進口，減少購買球具的花費。⁴⁵此外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開辦，讓臺灣的教育普及化，加上紅葉、金龍少棒引發的少棒熱潮，大家紛紛籌組少棒隊，讓更多臺灣人有了從小打棒球的機會。

經濟與社會的作用固然是榮工處發展棒球運動的可能原因，然而與榮工處創立球隊最直接相關的原因，卻是當時政府的體育政策。

45 關於球具的進口，當時全國棒球委員會以加強國家棒球訓練為國爭光為由，在 1969 年函請教育部放寬球具進口之限制，後由財政部准許得以免稅進口，而後經濟部亦開放國外廠商來臺設廠製造。〈關於各縣市少年棒球隊練習比賽所需硬式球具事〉，《教育部體育署檔案》，教育部體育署藏，檔號：0059/467.12/1。

五、榮工棒球隊成立的內部因素

國民政府 1949 年撤退來臺後，為配合「反攻大陸」之政策，使得當時的體育政策朝向尚武、國防體格以及國防體能來發展。換句話說，僅選擇軍事鍛鍊相關之體育活動來進行，這點特別在學校體育中被落實。⁴⁶社會體育方面則以舉辦競賽活動為主要實施方式，小從軍公教運動會、員工運動會，大至縣運會、省運會層級。

1963 年，臺灣省主席黃杰，針對當時各級學校體育課程未受普遍重視，深表疑慮與關切，因此告知教育主管當局，積極加強體育教學，同時並配合社會教育，發展全民體育，以重國民健康。⁴⁷1967 年再就全民體育發展之重要性，提出發展全民體育的指示：「關於發展全民體育，為期示範作用，各事業單位、金融機構、各林場、工廠，如其人力財力許可，似可先為提倡，組織球隊為公餘活動，以喚起國民對體育的重視。」⁴⁸並得到十項初步結論：（一）請政府財政主計單位准各公營機關工廠等單位編列體育經費預算，以利活動。（二）民營事業單位工廠等辦理體育活動事業開支，不作盈餘課徵營利所得稅。（三）協調財稅主計審計人事等主管官署，瞭解協助。（四）建議政府勸導民營事業單位特准外任用特優運動人才。（五）建議政府協調人事單位對公營事業單位工廠等員工參加體育活動出國比賽等，應於便利准予公假。（六）勸導民營工商單位准額外任用運動指導人員並列支津貼。（七）建議政府在各地積極整修建設運動場所。（八）鼓勵各事業單

46 劉照金、邱金松著，《我國體育政策變遷》（臺北市：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2008），頁 182-184。

47 〈教部將選百所中學 舉辦體育測驗 黃杰昨指示教育廳 全面加強體育教學〉，《聯合報》，1963 年 11 月 2 日，第 2 版。

48 此次指示收錄在臺灣省政府 902 次會議當中，〈秘書處宣讀第 902 次會議紀錄〉，《省府委員會議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501090302，頁 5-6。

位公私營工廠等，盡量參加對外比賽活動。(九)就目前各事業單位現有或未有組織，加強提高水準。(十)由臺灣省體育會輔導各公私營事業單位工廠等組織體育會所屬之「工商體育促進委員會」展開工作，由各運動協會負責辦理，推定裕隆、臺銀、電力、公賣、大同五代表籌備小組積極進行。⁴⁹這一連串的討論，開啟臺灣體育政策的新方向，即以全民運動及競技運動作為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重點，加上1968年國民義務教育強調四育並行的觀念，使體育漸漸退去軍事化色彩。

時代環境的作用下，讓榮工處的發展得以向國外延伸，儼然蛻變成國際型的工程企業。在企業發展允許的情況下，榮工處也開始思考員工的福利及娛樂，起初是舉辦小型的育樂活動，後來隨著活動規模的擴大，開始成立各類運動代表隊。不過如果沒有榮工處處長嚴孝章響應國家體育政策的話，可能不會有榮工運動代表隊的出現。

為了順應政府全民體育的發展政策，榮工處先後成立了籃球隊、桌球隊以及棒球隊，但其實嚴孝章心中最喜愛的運動是籃球。⁵⁰所以，當國民政府在推廣籃球運動時，榮工處便義不容辭的成立榮工籃球隊。之後榮工籃球隊並沒有辜負榮工處的期待，先後代表國家取得好成績，並在外交處境艱困的1960、1970年代做好「體育外交」的角色。⁵¹也因為榮工籃球隊的成功，讓嚴孝章決心投入其他榮工運動代表隊，以回應政府的體育政策。榮工棒球隊，正好搭上三級棒球起步的時代，亦響應全民體育政策而成立。

嚴孝章與棒球的淵源在榮工棒球隊成立之後也逐漸加深，1970年榮工

49 吳文忠，《體育行政》（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3），頁145-146。

50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臺北：民生報出版，1994），頁186。

51 翁偉峰，〈初探榮工籃球隊之興衰及貢獻（1961~1988）〉，《華岡史學》，2016年第4期，頁167-168。

處在關島地區進行美軍宿舍的興建，當時的關島棒球場周圍也是榮工處重新整建而成。因此，每每在關島舉辦遠東區棒球賽時，都會引來許多榮工處的員工前來觀賽，為臺灣選手加油的情形，臺灣小將們一到關島也總是受到榮工處的接待。⁵²1972年，嚴孝章更是獲關島棒球協會所贈之「卓越貢獻」獎牌，可以看出嚴孝章對關島地區不僅是建設上的貢獻，對該地棒球發展亦多所協助。⁵³

雖然榮工棒球隊成立初期，主要是給慈園學童做為課餘遊樂的運動，但不久就為了參加花蓮縣內選拔賽而轉型。為了厚實棒球隊的比賽經驗，榮工處開始在花蓮地區舉辦比賽，並積極參與國內的賽事。儘管球隊成立初期參加比賽成績並不突出，卻有逐步成長的趨勢，直到1976年打破眾人眼鏡獲得世界少棒遠東區參賽權之時，榮工棒球隊這支在後山悄悄練功的球隊開始被大眾看見。

1976年參加世界少棒遠東區決賽對榮工少棒隊來說，是關乎球隊未來發展轉捩點。因為臺灣自從金龍、七虎、巨人、立德以降，在遠東區的決賽可以說無往不利，連續獲得七次冠軍。但榮工少棒卻在遠東區的決賽就失利，輿論壓力下迫使嚴孝章思考該如何加強棒球隊的競爭力，因此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他透過關係找上曾經帶領立德少棒隊奪得世界冠軍的教頭蕭長滾，並與他討論榮工棒球隊未來發展的展望。之後蕭長滾帶了一批高雄的球員加入花蓮榮工，亦來到花蓮擔任教練職。眾所周知的是，蕭長滾

52 〈角逐遠東少棒錦標 中華小將安抵關島 三百餘名僑胞 機場熱烈歡迎 全隊精神愉快 今日開始操兵〉，《聯合報》，1972年7月27日，第六版。

53 〈關島棒球協會 感謝榮工處長〉，《聯合報》，1972年8月8日，第六版。關島棒球協會昨（七）日以一座「卓越貢獻」獎牌，致贈我國榮民工程處處長嚴孝章，以答謝榮工處對關島棒球運動之協助與貢獻。關島棒球協會主席卡勒勃及總幹事慕尼斯，於昨天上午十時，率同前來我國參加遠東區青少棒賽的關島青少棒隊全體隊職員，前往榮工處拜會嚴孝章，並致贈獎牌。

在 1978 年即帶領榮工青少棒奪得世界青少棒賽冠軍。

雖然榮工棒球隊終於得到世界冠軍，但嚴孝章不因為冠軍而滿足，依舊對球隊發展有所疑慮，因此他再與蕭長滾討論：

我去榮工第一年就得冠軍，嚴孝章找我去，他說現在得冠軍，我有甚麼想法，我們討論之後，覺得應該將球隊遷回臺北，因為公司也在臺北，不過花蓮的場地花崗球場設備雖然舊，但還是不錯，而且當時就要比賽了，臺北又沒有場地，恐怕將球隊遷回臺北有點困難。沒想到嚴孝章說，要一個球場沒有問題，那時因為要比賽了，所以為了爭取時間訓練，嚴孝章說一個星期可以完成，我想說怎麼可能，做一個球場一個禮拜。沒想到一個禮拜後，球隊遷回臺北時，球場就弄好了。後來我才知道，嚴孝章調動榮工處的資源，日夜趕工，調動工程車與工程人員一個星期完成。……嚴孝章很關心棒球，也很有魄力，聽說每天報紙送給他看，他都先看跟棒球隊有關的新聞，如果我去找他，遇到他還有其他事情或者客人，他就請我先說，對於棒球的關心，嚴孝章令我印象深刻。⁵⁴

就這樣，在 1978 年榮工棒球隊首先將少棒與青棒遷往臺北板橋，青少棒則是等到比完世界賽後才搬過去。自此榮工棒球隊結束自 1970 到 1978 年在花蓮發展的時代，更名「臺北縣榮工隊」。

嚴孝章因為成立榮工棒球隊開始與臺灣棒球的關係日漸密切，在謝國

54 謝仕淵，《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頁 97-98。

城⁵⁵過世後國內人士認為擁有榮工棒球體系，又有外交折衝長才的嚴孝章有資格接任棒協理事長一職。因此在 1981 年，身為榮工處處長的嚴孝章又同時兼任棒球協會理事長的職位。當時棒協副理事長林鳳麟就曾經談到嚴孝章擔任棒協理事長任內的貢獻：

嚴理事長在棒協五年間的功績，除大力提升成棒及少棒之發展，特別值得一提者尚有二事：第一件是，我國成棒隊參加過 1966 年尼加拉瓜洲際賽後，就被排拒在國際成棒之外，因此他一上任就積極擴展棒球在國際社會方面的良好關係……充分發揮他外交方面的長才，折衝於國際與亞洲棒壇之間，爭取國家棒協的支持；在他鍥而不捨的努力下，我國成棒隊終於 1982 年贏得第 27 屆漢城世界棒球錦標賽的冠軍。另一項貢獻，就是積極爭取我國棒協在國際棒壇應有的平等地位及待遇。由於他獲國家棒協的支持，使得我國棒協得以突破奧會模式的限制。⁵⁶

只可惜在 1986 年，為了榮工處業務出訪奧地利的嚴孝章，突然因為因心臟病病逝，⁵⁷還來不及看到隨後進行的世界盃擊敗古巴，也來不及實現爭取世界「四冠王」的目標。當時世界盃擊敗古巴後的中華成棒隊，在得知

55 謝國城，字萬里。生於 1912 年，卒於 1980 年 12 月，臺南人。戰後時期致力於推展臺灣棒球運動，為臺灣棒運奠下穩固的根基，因此被臺灣棒球界尊稱為棒球之父、少棒之父。

56 中研院近史所編輯委員會編，〈林鳳麟口述訪談〉，《口述歷史第五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1994），頁 229。

57 〈嚴孝章病逝奧地利！榮工處長廿七載 成就卓越 發展棒運盡心力 貢獻良多〉，《聯合報》，1986 年 8 月 3 日，第三版。

嚴孝章死訊後相當難過，國內外棒協均對嚴孝章逝世表達遺憾之意。⁵⁸

不論是榮工處職員、榮工棒球隊職員或是棒壇人士對嚴孝章的評價相當一致，都認為嚴孝章是一個對榮工處所屬任何機構的員工、任何球隊的球員視如己出的領導者。

榮工處長這個職位並不高，但是很多人都知道這個白髮如銀的嚴孝章，證明他個人的聲望是相當高的。喝酒是嚴孝章塑造熱血形象的重要一環，他大碗喝酒，把袍澤之情喝出來，榮工處員工在他這種豪情感染之下，對自己的事業和長官有一股特別的忠誠與信賴。⁵⁹

進球隊以後比較有接觸到的榮工處高層只有處長而已，記得那時候每到過年過節他都會來發紅包、陪我們吃飯，每年都會到，每年都會到慈園去陪一些榮民子弟還有棒球隊吃飯，聚餐還加菜，總之他對我們很照顧。⁶⁰

從以上的引文都可以了解到嚴孝章平日親和的形象，而且對象包含他所接觸的任何人，也可以理解當嚴孝章逝世後國內外對此事的震驚行為。

一切都來的又快又突然，嚴孝章的猝逝對榮工棒球隊而言又是一次轉捩點，榮工棒球隊因為嚴孝章的奔走下逐步累積實力，但在嚴孝章死後，

58 〈嚴孝章猝逝棒壇哀悼 少棒小將聯名寫封寄不出的信 成棒國手抱頭痛哭期盼護靈歸〉，《聯合報》，1986年8月4日，第三版。

59 吳俊德、田乃文，〈嚴孝章的心血成果：榮工處的發展一日千里 推展棒球運動震撼國際〉，《中華日報》，1986年8月3日。收在嚴孝章治喪委員會編，《嚴孝章先生哀思錄》（出版者不詳，1986），頁144。

60 筆者整理，〈榮工隊退役球員 U 口述訪談〉，頁2。

榮工棒球隊卻開始一級級裁撤，頗有人亡政息之意味。曾經擔任榮工棒球隊教練的高文章就說到：「榮工處支持棒球跟嚴孝章有很大的關係，但他本人不太瞭解棒球，他過世之後，榮工內部就認為不需要繼續支持棒球了。⁶¹」榮工棒球隊退役球員 U 則是談到嚴孝章逝世後，國內棒壇的轉變，以及榮工處對榮工棒球隊發展漸趨消極之情況：

他過世之後我覺得就變成臺灣棒球的黑暗期，那時候棒球協會還是嚴孝章當理事長，所以福利啊不會像現在棒球協會這樣，那時候福利很好，那時候只要是三級四級的國家隊，集訓吃的住的都很好，然後還有零用金。……榮工處組棒球隊對臺灣的棒球幫助很大，規模最大包含四級，所以對臺灣幫球的發展有很重要的地位，只是後來嚴孝章過世之後，整個局勢都改變了，榮工棒球開始一級一級刪，刪到最後剩下高中，高中早期是中華中學後來也轉到強恕，因為強恕願意出公費名額，中華中學則是要榮工拿學費繳，不願出公費名額。

62

可惜的是，本文依舊無法從嚴孝章的相關訪談得知為何榮工處在花蓮而不是臺灣其他地方成立榮工棒球隊。不過榮工棒球隊在花蓮的發展，甚至後來北遷板橋，都與嚴孝章有所關聯。嚴孝章身為榮工處在任最久的處長，其家父長形象深植每位榮工處職員、榮工運動代表隊員的心中，他對臺灣棒球的貢獻更在日後獲得「成棒之父」的美名。

61 謝仕淵，《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頁 162。

62 筆者整理，〈榮工隊退役球員 U 口述訪談〉，頁 2-3。

六、結論

總結榮工棒球隊成立之背景，追溯花蓮棒球發展的歷史脈絡是從日治時期開始。在花蓮的臺灣人從事棒球運動之濫觴，非林桂興與其成立之能高棒隊莫屬，雖然能高棒球隊後來大多赴日發展，但在戰後羅沙威（伊藤正雄）回到太巴壠地區教書，直接帶動當地棒球發展，不過當時僅限部落內小規模的運動；而戰後初期花蓮市周邊的棒球活動，依舊延續日治時期以企業球隊為主。但不同的是，一年一度的全國省運賽，不僅讓當時的花蓮人瘋狂，也讓花蓮各地的棒球菁英齊聚一堂，能夠分享彼此的打球經驗。在此背景下，榮工棒球隊延續了花蓮棒運的發展，亦結合來自光復地區日式的棒球傳統：因為榮工棒球隊利用歷經日治到戰後棒球參與者諸如葉日好、蕭長滾、高文章等人的經驗，來執教榮工棒球隊，此外還吸收來自光復地區從小從事棒球運動的學童。因此說花蓮榮工棒球隊繼承能高棒球隊以及省運花蓮棒球隊的特色也不為過。

追溯榮工處成立棒球隊之前在花蓮地區的發展，則是從榮工處承接中部橫貫公路工程開始。中橫的修築不僅開啟榮工處在花蓮的發展，為了利用修築期間偶然發現的大理石礦藏，榮工處設立大理石工廠並設置慈園等設施，讓工人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在外地工作。中橫完成之後，榮工處開始在花蓮地區進行一連串的公路建設，讓花蓮鄉間得以對外連結之外，亦提供許多工作機給給當地民眾。因此，「榮工處」的名號在 1960-1970 年代的花蓮可以說是「鐵飯碗」的代名詞。

本文除了介紹榮工棒球隊在花蓮成立之背景，亦對榮工棒球隊成立之內外部原因進行考察與探究。關於外部原因可以歸類成國際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因素，國際政治方面，由於 1960 年代末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間

接造成 1971 年退出聯合國的結果。也是因為退出聯合國，讓政府必須思考利用何種方式來提高國家在國際間的能見度，恰好 1960 年代末我國三級棒球的崛起，讓政府想藉由體育來達到這項目標。雖然榮工棒球隊並不是為了國際政治的考量而成立，但在發展的過程卻是一直受到國際政治的影響；經濟與社會方面，1960 年代開始臺灣的經濟型態正處於傳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的過渡時期，舉凡生活作息、消費習慣都與傳統農業社會有所不同。企業因為外國資本的加入而擴大，對企業以外（例如：員工福利、企業活動）資金的投入也開始變多。加上加工出口區的設置，讓國外廠商進駐國內，更是直接影響棒球球具的價錢。這些外部原因都提供許多想成立棒球隊的單位一個好的環境，榮工處就是其中之一。

榮工棒球隊成立之內部因素，則是來自國民政府的全民體育政策以及榮工處處長嚴孝章的決斷。1960 年代，國民政府的體育政策走出戰後初期國防體育的框架，開始推廣「全民體育」即以全民運動及競技運動作為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重點，榮工處在推廣初期即成立榮工藍球隊來響應此政策。而後將全民體育政策發展目標延伸至民間企業，許多民營企業諸如裕隆、大同紛紛響應。1968 年九年國教的實施更是將全民體育的概念落實到教育之中，使得各國小國中陸續成立運動代表隊。有鑑於榮工藍球隊成立後獲得不錯的回饋，為了搭上當時三級棒球的熱潮，嚴孝章又在花蓮慈園成立榮工棒球隊。

榮工棒球因為嚴孝章響應國家體育政策而成立，綜觀榮工棒球隊歷史，嚴孝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無疑是舉足輕重的，球隊因他的四處奔走、知人善任而崛起，卻也因為他的驟逝而讓榮工棒球隊逐漸走向沒落。此外，嚴孝章因為成立榮工棒球隊而開始與臺灣棒球發展接上線，更是在 1981 年接



任中華棒球協會理事長一職。在嚴孝章在任期間，除了推動許多成棒發展事宜，訂定相關制度，並積極參與國際重要活動，如：亞洲棒球聯盟、重返奧會。因此，對榮工棒球隊而言嚴孝章正如同家父的形象存在著，對臺灣棒球而言則是永遠的「成棒之父」。

榮工棒球隊的成立對花蓮棒球運動的影響非常深遠，因此有許多議題，諸如花蓮棒運在花蓮榮工隊時期的發展，以及榮工北遷板橋後的發展，甚至是為何花蓮棒球選手會選擇到西部發展而不是留在家鄉的原因，都與榮工棒球隊息息相關，因此本文做為一個研究花蓮在地棒球隊發展史的開端，希望引起日後喜歡棒球相關研究者的涉入，完成屬於花蓮地區的棒球史。



參考書目

一、史料：

1. 《省府委員會議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00501090302，〈秘書處宣讀第 902 次會議紀錄〉。
2.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檔案》，新北市：國家檔案局藏，A332410000K/0068/0110117/00001，〈百鍊成鋼（榮工棒球）錄影資料〉。
3. 《體育署檔案》，臺北市：教育部體育署藏。0059/467.12/1〈關於各縣市少年棒球隊練習比賽所需硬式球具事〉。
4. 榮工隊退役球員 U 口述訪談。

二、專書：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口述歷史第五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
2. 中華民國年鑑社編輯，《中華民國年鑑》，臺北市：中華民國年鑑社，1956 年。
3. 石忠山編，《太巴塢部落》，花蓮市：花蓮縣文化局，2008 年。
4.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輔導會真情故事—事業機構篇》，臺北市：退輔會，2007 年。
5.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輔導會真情故事—榮工事蹟篇》，臺北市：退輔會，2007 年。
6. 西協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日本兵庫縣：作者自行發行，

1996年。

7. 吳文忠，《體育行政》，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3年。
8. 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東花蓮港目次》，臺北：民眾公論社，1934年。
9. 徐宗懋，《三冠王之夢》，臺北：大地出版社，2004年。
10.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臺北：民生報出版，1994年。
11. 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50-1972）》，臺北市：五南出版，1993年。
12. 張敬果，《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臺北：作者自行出版，1983年。
13. 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臺北：我識出版社，2004年。
14. 湯川充雄 編，《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年。
15. 黃新興編，《續修花蓮縣志·交通篇》，花蓮：花蓮縣政府，1994年。
16. 葉柏強，《臺灣棒球史第一人：林桂興與他的時代》，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4年。
17. 緒方武歲 編，《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38年。
18.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出版，1985年。
19. 劉進慶，《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市：人間出版社，2012年。
20. 劉照金、邱金松著，《我國體育政策變遷》，臺北市：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2008年。
21. 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5年。
22. 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年。
23. 謝仕淵，《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出版，2012年。

24. 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2012年。
25.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果實出版社，2003年。
26. 瞿欣怡，《打一場生命的好球—棒球之父謝國城的故事》，臺北：天下遠見出版，2011年。
27. 簡永昌，《中華棒球史記》，臺北：作者自行出版，1993年。
28. 嚴孝章治喪委員會編，《嚴孝章先生哀思錄》，出版者不詳，1986年。

三、論文

1. 沈祥琳，〈榮工棒球隊興衰之研究〉（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學系碩士論文，2014）。
2. 林世曼，〈榮工處與東臺灣的建設〉（花蓮：國立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3. 孟峻璋，〈衝突與接納——解析日治時期引進棒球運動之過程演變〉，《臺灣史料研究》，28（2006.12），頁49-66。
4. 翁偉峰，〈初探榮工籃球隊之興衰及貢獻（1961~1988）〉，《華岡史學》，2016年第4期，頁161-184。
5. 曾祥麟，〈我國退除役官兵輔導就業制度史之研究—以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為例〉（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6. 蔡博任，〈國家機器與體壇風潮戰後臺灣棒球與籃球興衰之研究（1945~1992）〉（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
7. 蔡博任，〈躍向世界的野球：戰後臺灣基礎棒球發展與國家機器—以美和中學棒球隊興衰（1970~1983）為例的研究〉（成功大學歷史



學系碩士論文，2005)。

8. 蕭長滾口述、曾文誠整理，〈滾滾棒球長流蕭長滾〉，《職業棒球》，225期（2000年12月），頁44-47。
9. 駱香林，《花蓮文獻創刊號》，花蓮：花蓮文獻委員會，1953。
10. 鍾淑敏，〈政商與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收錄在《臺灣史研究》，11:1（2004年6月），頁79-117。

四、網路資料

1. 臺灣棒球維基館（2016/11/6 閱）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9%A6%96%E9%A0%81>
2. 榮工棒球隊首頁（2016/11/6 閱）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5/jshps602/index.htm>

五、報紙雜誌

1. 《榮工報導》
2. 《聯合報》
3. 《更生日報》
4. 《中華日報》

